

中国文史考

五

何云昭 主编

目 录

千秋文苑（续）	1
《太平天日》的作者	1
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	4
清代女词人贺双卿	9
《中国共产党宣言》最早中文原件	12
马克思的中译名	15
翻译家林琴南的小说	16
李商隐《无题》诗的主题思想	18
名著探源	21
孔子写作碑文	21
《山海经》作者小考	24
说不尽的《周易》	27
《诗经》探源	28
《周易》与“天书”的传说	30
世界上第一尊佛像的塑造者	32
人类最早的文字	35
最早用汉字介绍培根的人	39
《离骚》考察	42
《吕氏春秋》成书年代	47
刘勰与定林寺	49
孟轲与“亚圣”之称	53
蔡文姬与《胡笳十八拍》	56
《洞仙歌》词作者考辨	61
《题临安邸》的作者	64
《洛神赋》与洛神形象	67
宋玉及其作品	72
屈原与《涉江》	75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	77
《出师表》刻石书法作者	79
《满江红》作者争辩	81
《昭明文选》撰编地址	83
贾谊《新书》真伪	86
词的起源	90
“百代词曲之祖”归属	92
李白《蜀道难》主题思想	94
李白《朝发白帝城》写作时间	96
“兰陵”何在	98
李白醉酒中诗歌	101
《枫桥夜泊》有何深意	104
苏轼诗中的“朱陈村”	106
《锄禾日当午》作者	108
李贺与七言近体诗	111
温庭筠词的寄托	113
王之涣的争议	116
《虬髯客传》的作者	119
《感遇》创作时间	121
《姑孰十咏》的作者	123
两宋“江西诗派”	127

千秋文苑（续）

《太平天日》的作者

据说：1837年，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曾被天父皇上帝派天使接上了高天，天母替他洗除污秽，开膛破肚，出旧换新。然后，天父皇上帝给他指点凡间妖魔迷害世人的情况，并赐给他一方“金玺”，一把宝剑，带领他驱逐妖魔。天父皇上帝还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并遣他下凡“斩邪留正”，做统治天下万国的“真命天子”……如此云云。这个有头有尾，活灵活现，令人遐思的福州故事即出自著名的《太平天日》一书。《太平天日》记述了从1837年洪秀全死而还魂上天受命诛妖到1847年11月洪秀全捣毁象州甘王庙后返回贵县赐谷村的史事，为今存唯一的太平天国自编史书，是研究洪秀全早期活动和思想的重要资料。《太平天日》的作者究竟是谁？却始终没有统一的答案。

《太平天日》原件在国内早已佚失，目前所见是解放前北京图书馆王重民先生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复制而来。在复制的封面上，即未注明作者姓名，只有“此书诏明于戊申年冬，今于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钦遵旨准，刷印铜版颁行”之语。于是，各种说法纷至沓来。

有的学者因为《太平天日》内容与洪秀全思想颇多相似之处，故而推论出该书为洪秀全所作。这类意见并

不少见，比如，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就说：“在广西期间，洪秀全又撰写了《原道觉世训》和《太平天日》”。有的著述虽未明说，但在所引《太平天日》资料时，也把作者注为洪秀全。然而，这种说法不能不留给我们一个疑问：如果《太平天日》真为洪秀全所写，那么，包揽洪秀全金田起义前所有著述的《太平诏书》为何独不收此一篇？尚且，此篇内容多为洪秀全的溢美神化之词，由洪秀全自己来写是否方便？

有的学者似乎对这个问题有所觉察，于是又提出了洪仁王干作《太平天日》之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在“太平天日”条目中就是这样解释的。北京图书馆在给《汉语大字典》第二编写组的信中也说：“关于《太平天日》作者问题，是洪仁王干”。其依据是：今见此书是王重民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复制而来的，而王重民曾谓之“仁须〔〕女此书”，还说此书虽“不著撰人姓氏”，但“以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校之，盖即洪仁王干所撰也”。由此可见，《太平天日》为洪仁王干所作的结论，是其复制者王重民拿《太平天日》与《太平天国起义记》互相校正后推断出来的。那么，这个结论是否无懈可击了呢？

对此，一些学者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发现韩山文写《太平天国起义记》时，确曾参考过洪仁王干提供的材料，但它不是《太平天日》，而是《洪秀全来历》和“洪仁王干问答”。并进而指出，洪仁王干对作为官书之一的《太平天日》作过“删润”、“修改”是可能的，但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太平天日》初稿也是洪仁王干所作的结论。那么，《太平天日》究竟是谁所著的呢？

王庆成在《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一文中指出：“《太

《太平天日》既诏明于 1848 年冬，可以判定，它的内容就是洪秀全、冯云山密商筹议时确定的”。陈旭麓主编的《近代中国八十年》也说：“大约在 1848 年冬，洪秀全经与冯云山商量后，写了《太平天日》一文。”这样，就把《太平天日》的作者判给洪秀全和冯云山两人了。这种说法倒有一定道理。因为：1847 年、1848 年间，洪秀全与冯云山多次在广西各地领导革命斗争，《太平天日》所记之事均所亲历，这是他们合作此书的先决条件；而且，1848 年阴历十月，两人再次会面于花县时，与《太平天日》“诏明”的时间几乎一致，可谓顺理成章。

然而，学者们并未满足于已有的结论，他们在基本倾向于上说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探索，认为“《太平天日》很可能是冯云山所写”。其理由：第一、冯云山对《太平天日》所记之事比较了解，大多是亲身经历的；第二、由冯云山来写洪秀全的革命事迹较之洪秀全自己来写更为合适；第三、据洪秀全《天历每四十年一斡旋诏》可知，冯云山曾在狱中编制“太平天历”，由此推论，冯云山也可能在狱中同时写了《太平天日》初稿，否则，《太平天日》公布的时间与洪秀全同冯云山会面的时间几乎一致就难以解释；第四、罗尔纲曾说太平天国《诏书》“前出冯云山手，后出曾钊扬、何震川诸史官手”。《太平天日》是其《诏书》之一，且叙述金田起义前之史事，这就更能佐证它可能是冯云山所写。除此，冯云山从小就学得了一套中国旧文化知识，为他顺利完成此书的撰写提供了有利条件。

关于《太平天日》作者的诸种说法，虽然都各有其理由，但大多系推论而来，缺乏令人心悦诚服的依据，就连提出“冯云山说”的学者也不得不指出：“我们的这

个看法能否成立，自知尚须进一步研究，找出确凿史实证明”。

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制度，自随唐始创，辗转沿袭 1000 余年，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治国良策。近代农民革命政权太平天国建立之后，一时除旧布新，横扫封建旧制，唯独科举制度得以幸存，并贯彻于天国始终，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措施，对太平天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太平天国科举考试从何时开始，却说法不一。

一、始于初入武昌期间：清末革命党人刘成禺在《太平天国战史》一书中提出此说。他认为：在太平军初次攻克武昌期间，即咸丰二年（1851 年）12 月 4 日至次年正月初二日，天王和东王曾共同主持过一次会试。其主要依据是太平天国“举人”“黄冈刘鹏”的口碑资料。但是，据《贼情汇纂》记载，西征军再次攻克武昌期间，确曾举行乡试，而非会议；《世载堂杂忆》又载，刘鹏所言是“太平军占领武昌，开科取仕”，并无“初入”之意；再者，太平军初入武昌期间，为时甚短，尚且革命未果，形势紧迫，哪容安下心来开科取仕？可见，“初入武昌”之说是漏洞不少的。

二、始于辛开元年在广西永安州时：此说是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老先生提出的。罗老在他的《太平天国史稿》中认为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才开科取仕的，后来看到清朝钦差大臣赛尚阿的机要幕僚丁守存的《从军日记》，日记中记他随赛入永安州城见州署外贴有许多诏旨谕告，其中有关于“万寿诗朕考取名次榜”之语；又

据天王生在十二月初十日推算出太平天国举行万寿诗朕考试的时间是在辛开元年十二月初十日。于是在 1954 年重写《史稿》时，改变了过去的说法，指出：“太平天国举行考试，始自辛开元年(1851 年)在广西永安州时，当时一榜取录了 40 人，第一名便是南王冯云山，主考官当然就是天王了。”此说一出，不胫而走，各种著述竞相转用，如商衍鎏的《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酈纯的《太平天国的制度初探》、董蔡时的《太平天国在苏州》、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辞典》以及新版《辞海》等均采此说，似乎已无争议。可是，近年有的学者经过考证，认为此说也值得商榷，反而对罗老旧说表示赞同。

三、始于定都天京之初：徐川一同志《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始自辛开元年在广西永安州时”吗？》一文，对这个观点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太平天国举行考试，始自辛开元年在广西永安州时”的说法，“不仅误解了有关史料，而且也忽视了对太平军在永安后期所处环境的分析”。“应当说，罗老原先的说法，即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是始自癸好三年定都天京之初的说法正确。”因为：“说太平天国科举考试始自癸好三年定都天京之初，本证、旁证俱在”。《钦定士阶条例序》即说太平天国“自癸好开科”。《贼情汇纂》言“贼之于癸丑岁开科江宁”；佚名《平贼纪略》也有太平天国“举伪试，取伪科，癸丑至壬戌十年”的记载；再者，太平天国定都之后，建立了政权，局势相对稳定，举行开科取仕不仅需要，而且可能。那么，太平天国的首试究竟是何时何试呢？过去一直认为 1853 年的“东试”（即以东王杨秀清生日为试期举行的会试）是为首试。对此，徐川一同志经过一番考

证，指出此说虽有史料根据，但却颇多可疑之处。认为其首试当是 1853 年旧历六月举行的“北试”（即以北王韦昌辉生日为试期举行的会试）。其依据主要是《金陵省难纪略》中有当时曾在天京的张汝南的一段话，其中叙述了这次“北试”的具体情况，但未说明这次“北试”的确切日期，而这一点又为《忆昭楼时事汇编》所辑清方探报中的两件信函所补充。于是得出太平天国科举考试“始自定都天京之初，始自一八五三年旧历六月的‘北试’”的结论。

徐川一的观点发表后，罗老随即发表《对旧著〈太平天国史稿·科举志〉举行考试始自永安州时的说法订误》一文，接受了徐川一的意见，并说他的错误主要在于没有把“科举”的性质与“考试”的性质区别开来，辛开元年举行的万寿诗联考试的目的在于庆祝天王生日和评定群臣文学的高低，并非科举考试。如此，罗老又回到自己提出的旧说上了。

这样一来，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其实不然。如果说，罗老提出“辛开永安”之说仅仅是因为混淆了“科举”与“考试”的性质，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知名学者对这个并不深奥的问题竟毫无觉察？甚至，清光绪甲辰年（1904 年）科举中考取“探花”，并对清代科举制度素有研究的商衍鎏老先生也以此为是？再者，“考试”与“科举”这两个概念究竟该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罗老也说，对有争议的问题，要互相切磋，“为百家争鸣提倡一种好风气”。这个建议，在这里仍然适用。

《哀牢夷雄列传》质疑

《哀牢夷雄列传》，（下称《列传》）经《近代史资料》1957 年 2 期发表后，对云南哀牢山区爆发于 1856 年 5

月的李文学起义，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发表了不少文章，出了专著，纳入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中。1979年至1982年，某些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对《列传》的真伪问题提出怀疑，出现过一场大的争论，见诸刊物的文章有10篇之多。

首先在史实方面，争论的双方就咸丰六年五月(1856年)解大理之围、李军的攻城夺地、李文学受杜文秀封为“大司藩”、王泰阶和李学东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三份彝文宗谱的可靠性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里只就李军赴援和王、李二人与太平天国的关系问题略作介绍。

质疑者认为，《列传》所述咸丰六年五月清军20000人攻大理，李军解围，三败清军于弥渡红崖等地不确。杜文秀在“大理回民起义系在八月，是完全肯定的。五月大理起义还未爆发，那来的‘围’可‘解’”。当时在大理附近有提督文祥和鹤丽镇标千总张正泰两支清军。文祥于同年三月，在远离大理以东的姚州等地与回民起义军打仗，七年一月(1857年)移祥云，攻红崖。此前，文祥与杜军并无接触。张正泰于六年九月在大理以北经上关攻大理，被大理回军击败退邓川。六年五月前后，在戏崖等地既无清军又无回军，李军于红崖等地“伏击‘满军’之说，岂不是空谈”，邵献书认为，《列传》所载李军在此后会五次协同杜军对清军作战，他种史籍不曾有载，“如果不是《列传》虚构，又将作何解释！”他又指出，王泰阶、李学东从参加到离开太平军的有关情节使人难以置信。《列传》说，王、李二人是咸丰三年秋(1853年)在湘桂间加入太平军翼王石达开部的，而此时石在安徽的安庆，其部也不在湘桂，所谓李学东在战场上两护翼王，因功受“侍卫长”，查太平军的军制和官制，

并无此职之设；咸丰四年三月(1954 年)“翼王小挫，李学东受创”，此种说法与石达开的行踪不相吻合。石于咸丰三年十一月或四年三月奉东王召回天京，无“小挫”之事。石无“小挫”，李的“受创”从何而来？王、李“两人在太平军中的事迹是不真实的，而他俩又是太平天国与这一斗争发生直接关系的唯一居间人，所以，这一斗争谈不上与太平天国有什么关系”。

肯定《列传》的同志认为，张渡红崖之战是存在的，事在咸丰七年一月至三月，七月又在弥渡将清军战败，赵州清军前后受敌，被迫东退镇南。此次为时数月对清军的作战，据《列传》所载是有李军参加的，只不过在时间上误为咸丰六年。“我们如果因为《列传》把弥渡之战的时间记错，过程记的片面，就斥它为‘凭空编造的无稽之谈’，未免失之公允”(王天玺《应当肯定“袁牢夷雄”的历史作用》。)王、李二人在太平军中是两名战士，“历史文献中当然找不到他们的事迹。”据《李秀成自述》，1852 年至 1853 年，太平军在湘桂间有过一次大的扩军，入伍人数在 50000 以上，“王、李在此时此地参加太平军是有可能的”。从多次的实地调查和不少的文物资料证明，李军在斗争的口号、土地制度和民族政策等方面，明显地受着太平军的影响。当地人民为了尊敬和怀念王、李二人，将他们的大名不是刻在庙壁上，就是流传在有关的唱词中。“完全可以说，袁牢彝族起义是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

其次，关于《列传》的作者问题。质疑者认为，既然《列传》的作者夏正寅身为廪生，参加李军帅府任秘书，与其斗争相始终，理应不会在史实方面出现那么多的错误，也不应在 20000 字的手稿中，出现错字和纪年

上的错误数十处之多；既然作者是李军的一名忠诚战士，怎么可能在李军失败后去参加(光绪)《镇南州志》的编修工作；如果真的参加了，为什么对李军如此之大的事件在州志中毫无反映，而彝族鲁贯石的起义在州志中却有记载。“究竟《列传》是出自夏正寅之手，还系他人托笔就值得考虑了。”肯定者说，《列传》的部分失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李军的档案已毁，作者晚年失明，不可能去进行实地调查和查阅清方资料，撰写中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李文学之名在州志中虽未出现，但其都督起才顺(杞彩顺)的活动是有所涉及的。

第三，李文学起义尚需重新研究。质疑者指出，览于《列传》谬误甚多，不是信史，应“在进一步发掘史料和实事求是地调查的基础上，充分开展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庶几不难恢复李文学等彝族反清斗争事迹的真实面貌”。肯定者认为，《列传》虽在失误之处，但并非伪造；李文学起义虽有再研究的必要，但并非虚构，同时提醒质疑者们注意：“仅仅局限于清方文献和志书来论证《列传》的真伪是很不够的”，“李文学起义失败至今才100年，时间不算长，用实地调查和考察的材料来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提供鉴别文献资料的参考，是不能忽视的。”

李文学起义的史实究竟如何？尚待人们认真研究，去伪存真，恢复其本来的面目。

清代女词人贺双卿

一些报刊相继介绍了清代女词人贺双卿(生于康熙、殁于乾隆年间)的事迹，说她的词是“古今逸品”，可称

为“清代第一女词人”。又说她写词，皆身边事、周围人，感情真挚，常以民间妇女口吻用笔，朴素生动，细腻悲怆。请读《凤凰台上忆吹箫》：“寸寸微云，丝丝残照，有无明灭难消。正断魂魂断，闪闪摇摇。望望山山水水，人去去隐隐迢迢。从今后，酸酸楚楚，只似今宵。青遥，问天不应，看小小双卿，弱弱无聊。更见谁谁见，谁痛花娇？谁望欢欢喜喜，偷素粉写写描描？谁不管。生生死死，暮暮朝朝？”一首词，全用源于生活的语言，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却巧用叠字，咏叹回环，使得词意格外婉约多姿，缠绵悱恻，是长期生活在下层、倍受压迫、欺凌的双卿自述境况的凄绝哀歌。其艺术造诣即使不说可与宋代著名女词家李清照媲美，却也真是“如小儿女啾啾絮絮，诉说家常，见见闻闻，思思想想，曲曲写来，头头是道。作者不自以为词，而阅者亦忘其为词。而情真语质，直接三百篇之旨，岂非天籁？岂非奇才？”。

第一个把双卿介绍给人们是乾隆丁巳进士、江苏金坛的史震林，他在《西青散记》这本书中写了双卿，对她的诗词作了介绍。随后，生活于史震林之后的董潮，道光年间海盐黄燮清，清末南陵徐乃昌都用重笔浓彩描绘了这位颇负才气的民间女词人。徐志摩亦曾向别人推荐过由张寿林编的《贺双卿雪压轩集》。正当词界对双卿诗词掀起一股小小热潮时，胡适撰文《贺双卿考》，全盘否定“贺双卿”，说没有这个人，是“这班穷酸才子在白昼做梦时‘悬想’出来的‘绝世之艳，绝世之慧，绝世之幽，绝世之韵’的佳人”。他提出五疑：一疑为各位作者称“双卿”不同；二疑为“籍贯”一说“丹阳”，一说“金坛”；三疑为“性格”有异；四疑为年龄提法不一；五疑为病中苦力女子在“芦叶”上写长词调不可信。这

五疑并没有被人们所接受。胡文发表后，上海将《西青散记》数次再版。丹徒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再度溢美双卿词，叶恭绰收双卿词入《全清词钞》，肯定双卿之风盛起。

《西青散记》介绍双卿是这样说的“双卿者，绡山女子也”；董潮《东皋杂钞》卷三《艺海珠尘·土集》说她“庆青，姓张氏”“金坛人”；黄燮清《国朝词综续编》收双卿词 11 首，称她“贺双卿”；徐乃昌《闺秀词》有双卿小传，称“贺双卿，丹阳人”；民国 16 年付印的《丹阳县志》载：“贺双卿，丹阳蒋墅人，适金沙周氏”。而同时付印的《续志·卷二十四》称：“双卿姓贺，丹阳人”并不提蒋墅。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一、贺双卿或双卿，或张庆青；二、丹阳人或丹阳蒋墅人，或金坛人；三、绡山女子与适金沙周氏。据丹阳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9 个月的调查材料说：《丹阳县志》与《金坛县志》的各种版本均没有“绡山”字样，《金坛县志》也不载双卿事；丹阳蒋墅乡有贺姓，却无其传说。《西青散记》中说，史震林同时代人、蒋墅乡塾先生贺定敷闻说双卿便要一访。蒋墅贺姓居住相近，两人却互不相知。这材料本身对双卿的存在就提出了一个疑问。金坛县境内的方山附近有个叫小尖山的地方，山上有一庙，二层建筑，曾称为“西乾禅院”，登楼可以看到茅山山顶石级，庙后有巨石，北边断崖，庙旁是竹园，民间传说是一进士隐居读书的书院。这些实景却与《西青散记》中的“绡山”描写近似。丹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认为：“长期生活在生活底层，官场不得意的史震林，接触了不少受封建压迫的不幸女子，诗人同情她们，为她们发出了不平的哀鸣。贺双卿是史震林借托的人物。”这一观点被一些

学者所赞同。

到底有没有贺双卿其人，争执近百年来未有定论。

《中国共产党宣言》最早中文原件

1920年11月7日，一份既秘密又公开的新杂志在上海创刊。这家杂志的刊名，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叫《共产党》，它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主编李达。

11月7日，正是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陈独秀为《共产党》创刊号写了《短言》，相当于发刊词，非常明确地提出“跟着俄国的共产党”。李达、沈雁冰、李汉俊、施存统等分别化名在《共产党》创刊号上发表《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俄罗斯的新问题》以及专门介绍列宁的文章。

就在创办《共产党》月刊的日子里，由陈独秀执笔、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参加讨论，起草了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宣言！是筹建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

《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指出“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共产主义者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没有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

第二部分是“共产主义的目的”，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

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资本家政府的被推翻，和政权之转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手，这不过是共产党的目的之一部分，已告成功；但是共产党的任务还是没有完成，因为阶级斗争还是继续的，不过换了一个方式罢了——这种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部分是“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这种建设法是由无产阶级选出来的代表——最有觉悟和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中之一部分——所制定的”。“一直等到全世界的资本家势力都消灭了，生产事业也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开始活动了，那时候的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

作家叶永烈在《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一书中介绍了这篇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宣言部分内容后，继续写道：“这篇《中国共产党宣言》虽然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那么气势宏伟、文采飞扬，但写得简明扼要、通俗明白。这篇在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之前写下的宣言，其中的原则迄今仍为中国共产党所遵奉。”

不过，这篇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没有公开发表过，它的中文稿原件，迄今不知下落。现存于世的只有英译稿。

叶永烈说，1956年，当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移交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内中存有这篇宣言的中文稿。但这一中文稿不是原件，是根据英译稿还原译成的。译为“Chang”，亦即“张”（也可译成“章”、“常”、“昌”、

“长”等)。这位不知其名的姓“张”的译者在《中国共产党宣言》前面加了一段说明：

译者的说明：

亲爱的同志们!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十一月间决定的。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这宣言之中文原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所以兄弟把它从英文稿翻译出来。决定这宣言之时期既然有一年多了，当然到现在须要有修改和添补的地方，我很希望诸位同志把这个宣言仔细研究一番，因为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要注意这种重要的文件——共产党宣言。并且会提出远东人民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组讨论。讨论的结果，将要供中国共产党的参考和采纳。

chang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这位姓“Chang”的同志究竟何许人?叶永烈认为，要么是张太雷，要么是张国焘。因为在出席远东人民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中，只有两“张”。这两人的英语都不错。不过，据中共党史专家分析，由于张太雷“不仅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而且负责英文翻译”，因此，由张太雷译出的可能性更大些。至于原先的中文稿，是由谁译成英文，已很难查考。很可能是陈独秀写出《中国共产党宣言》之后，由李汉俊译成英文，交给魏金斯基，而魏金斯基把英文稿带到苏俄。当然，这只是“可能”罢了。

总之，《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文稿原件是否还存在人世?原存于苏俄档案的那件英译稿，译者究竟是谁?原存的中文稿，究竟是由谁译成英文并带至苏俄的?这都是党史研究中的课题。